

孙玉石 钱理群 编

王瑶 阅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



014039009

K825. 6
1108

王瑶 阅读

孙玉石 钱理群 编



K825.6
1108



北航

C1726320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王瑶/孙玉石,钱理群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301-24012-0

I. ①阅… II. ①孙… ②钱… III. ①王瑶 (1914 ~ 1989)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092 号

书 名: 阅读王瑶

著作责任者: 孙玉石 钱理群 编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012-0/I · 273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6 开本 27.25 印张 356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王瑶先生



1945年的王瑶先生



1983年王瑶先生在未名湖畔



王瑶先生与夫人杜琇女士

照片：清华大学档案馆

新文化运动发生於五四运动的前夜，它為五四爱国运动在思想上做了准备和准备，並使五四运动在文化战线上，是更广泛上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辛亥革命时期，已经有些人把西方资产阶级阶级的文化是介绍到中国来，这种文化是對於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以毁灭的旧文化说来，当然是新的东西与对立的方面。但因為中国资产阶级阶级的先天不足，而這些介绍进来的新的知識分子本身也仍然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

他们不敢把新的东西彻底与封建主义对立起来，並使五四运动的態度，反而企图在东西之间找求调和和苟同点，找求调和与妥协。到了五四前後，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使这种新文化运动，它不仅运动地发展起来，而且增加了底层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是王康的分析，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已有了一个进一步的發展，而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光已越过了界限，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美、日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等三國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因而发生了

目 次

上辑 为人但有真性情

- 003 哭昭琛 / 朱德熙
- 007 宛在的音容 / 赵俪生
- 011 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 / 季镇淮
- 018 昭琛二三事 / 范 宁
- 023 一个冷隽的人 一个热忱的人 / 乐黛云
- 026 王瑶先生 / 王得后
- 035 夕阳下的王瑶先生 / 王得后
- 044 他拥有绿色的永恒 / 孙玉石
- 053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
——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 钱理群
- 067 最后的和最初的日子 / 吴福辉
- 073 学 魂 / 凌 宇
- 082 王瑶先生杂忆 / 赵 国
- 090 写出的与写不出的 / 温儒敏
- 094 深切怀念王瑶先生 / 任伟光
- 098 念王瑶先生 / 陈平原
- 129 瑶华圣土
——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 / 徐葆耕

- 139 风雨燕园四十载
——王瑶先生与北京大学 / 孙玉石
- 150 “挣扎”的意义
——读《王瑶全集》 / 钱理群
- 164 我的老同学王瑶 / 韦君宜
- 167 文件中的王瑶 / 陈徒手

下辑 治学犹能通古今

- 185 论文学史家王瑶
——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 樊 骏
- 243 王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断想
——以《中古文学史论》为中心 / 孙玉石
- 272 他是“清华”的，也是“古典”的
——王瑶先生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 钱鸿瑛
- 296 王瑶先生对中古文学研究的贡献 / 葛晓音
- 307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历史地位 / 黄修己
- 315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 / 温儒敏
- 339 某种启示：鲁迅研究史
——过程中的王瑶先生 / 高远东
- 350 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
——谒王瑶书 / 夏中义
- 418 我理解的王瑶传统 / 钱理群
- 429 编后记

上辑

|

为人但有真性情

哭昭琛

朱德熙

1942年昭琛离开部队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有一段时间我跟他都住在紧靠北院后墙的一座小楼上。那时他刚从山西辗转转到昆明，叙说沿途见闻，分析抗战形势，不但绘影绘声，而且有独到的见解，十分引人入胜。所以他一开讲，总会吸引不少同宿舍的人来围着听。因为是同系，又住在一起，朝夕见面，渐渐熟了起来。1943年，云南耆宿李根源先生创办了五华中学，昭琛和我都去那里任教。五华中学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因为管理得好（校长是根源先生哲嗣希泌先生），教员阵容整齐（全都是联大青年教员和研究生，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兼过课），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人才。昭琛在五华任教三年多，参与学校筹划，功劳很大。五华中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师生之间特别融洽，昭琛那时住在学校，跟同学的关系尤其亲近。

抗战胜利后，我和昭琛同到清华中文系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时，又一起来到北大，先是同学，然后是同事，加在一起将近五十年，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他的逝世，我是十分伤心的。

昭琛爱说笑话，因事设譬，往往击中要害，把本来不甚分明的事一语道破，因而使人觉得可笑。例如70年代北京市各单位新建很多职工宿舍，开间狭小。昭琛说那是“机械化养鸡”。他说这类话本无恶

意，只是为了逗乐儿，可是给人的印象是他这个人有点玩世不恭。在西南联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同陈梦家先生开的《尚书》课。虽是师生，陈先生比他大不了几岁。有一次陈先生给他写了一个便条，称他“王瑶贤弟”。他回信的时候就称陈“梦家兄”，并且跟我说：如果我是他的“贤弟”，他自然是我的“仁兄”了。说昭琛玩世不恭是了解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重友谊、爱国而且有正义感的人。有一回聊天的时候，谈起我国建设中碰到的困难，他越说越激动，眼眶里满含眼泪，他会在这样大而无当的问题上如此动感情，令我十分吃惊。还有一次，当他说起一个我们教过的老学生的不幸遭遇的时候，不禁哽咽失声。我想一个对世界抱着冷漠、旁观、不负责任的玩世不恭的人是不会在这些与自己利害无关的事情上动感情的。1967年，北大学生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农民对付地主的“杀猪出谷”的办法拿来对付教授，要我们出钱支援“文化大革命”。派在我名下的是三百元。那时候扣发工资，我每月只能领到几十元生活费，平时也没有什么积蓄。昭琛知道我交不出来，偷偷塞给我三百块钱，免了我一场灾难。

昭琛爱说笑话，因为他有幽默感。我认为，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幽默感非常重要，因为它能产生某种防护作用，使我们在逆境中可以自我解嘲，让感情有一个小小的出口，不至于崩溃。我想昭琛的幽默感一定起过这种作用。记得在“文革”中我们一起劳动的时候，他有时还说一两句笑话，就是明证。不过幽默感在这方面的作用只相当于苦笑，并不能从根本上排除痛苦。昭琛在“文革”中不但在精神上遭到凌辱，肉体上也受了许多折磨，这些都不是一点幽默感能够解脱掉的。我不愿意在他身后重提这些旧事，使生者和死者都不得安宁。

昭琛在古典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两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他做学

问同时占有两种优势：一是记忆力强，过目不忘；二是聪明绝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细密的分析力，无论知人、论世、治学，多有深刻独创的见解。对于一般人来说，有其一就受用不尽，他兼备两者，所以成就大。由于才高、兴趣广，除了读书，还关心现实，所以他做学问总带着点逢场作戏的味道。有一次，我说起一位老朋友，昭琛说，“他跟我不一样，是真正做学问的人”。这也许是谦辞，但至少可以说明他并没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问上头。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988年11月，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会。我和昭琛夫妇都去参加了。我们早就有同游昆明的打算，这次终于实现了。我和昭琛虽然都住在北大，因为离得比较远，因为忙，见面的机会不算多。这回在昆明同住在一幢楼里，朝夕相对，几天里聊的“天”比在校内几个月还多。特别是老学长吴征镒邀我们到他工作的植物研究所去参观，又就近游了阔别多年的黑龙潭。同游者除昭琛夫妇外，还有沈克琦夫妇、王乃梁夫妇。回想当年游黑龙潭，我们还都是翩翩少年，五十年后重游旧地，都成了白发衰翁，这自然令人感慨。可是那一天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些，只是为能有机会同游旧地感到兴奋。联大同学对昆明有一种特别深的感情。因为我们最值得怀念的大学生生活是在那里度过的，我们的人生观、道德观是在那里形成的，我们的学术生涯是在那里开始的。很多人的爱人是在那里遇见的，最好的朋友是在那里结识的。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这次游昆明是一件大事。我和昭琛虽然这几年不止一次到过昆明，但同游却是第一次，所以特别高兴。万万想不到，这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相聚。回到北京以后，5月中我去看过他一次。那时北京形势很紧张，我因为出国在即，没有多谈就告辞了。

昭琛生前不止一次跟我开玩笑说：“我死了，非得由你来念悼词。”想不到一时戏言竟成谶语，他果然先我而去。初闻噩耗，五内如焚。云山阻隔，不能亲临吊唁。谨以香花醴酒遥奠于太平洋之彼岸。这篇怀旧短文，权当生前约我写的悼词。昭琛地下有知，当有以报我于梦中。

宛在的音容

赵俪生

小时候看人家出丧，见挽幛上四个大字：“音容宛在。”当时看过也就过去了。而今垂垂老矣，由古稀向耄耋转进，若干至亲好友一位跟一位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一觉醒来，“落月满屋梁”，这才矍然领会到上面四个大字的确切意义。

我与王瑶兄是大学时代的同窗学友，自1934年至于1937年，首尾四年。那时候，我们一起到教室听课，一起到大食堂或小饭铺吃饭，一起到琉璃厂买旧书或到北京饭店楼下法文图书公司买外版书，一起在城内大街上游行示威，一起组织会社、编刊物、写文章。那时，我们一伙青年朋友们自发地各有所好，各有所趋，有的写小说和报告文学，有的写诗或散文诗，有的搞翻译，王瑶兄一直喜爱并写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因此，我们私下里对他有“小周扬”和“小胡风”这样的称号。

王瑶兄一直是快步走路，急口说话。他走起路来，得得作响。他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但我留心到，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敬，我想这是原因之一。当时我曾对另外的同学说，“假如我是个女同

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他理性能力很强，非常善于辩论，在一场辩论中从不饶过对方。他口边喷着唾沫，两手挥动，我们私下里说这是“抛砖引玉”。

我们当时组织过两个会社，一个叫“国防文学社”，出版《国防文学》两期；一个叫“清华文学会”，出版《新地》两期。王瑶兄还主编过第四十五卷《清华周刊》。但就在他手里，《周刊》被教务长先生勒令停刊了。王瑶兄写了一篇“告师长同学”的大文，这篇文章在当时很有名气，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显示了王瑶兄的气度。

可是在卢沟桥事变前的一段时期里，王瑶兄的情绪不是很高扬的。他主编的刊物被勒令停刊了，此其原因之一；当时的革命，虽然瓦窑堡精神已经下达，但正如少奇同志文章里讲的，左倾关门主义残余仍很严重，组织对成员的看法有时很片面，有时也引起成员对基层组织有看法，此其二；王瑶兄在爱情上也遭挫折，此其三。前一条是众所周知的，后两条是我作为密友探测出来的。为此，他很早就启程返回他的故乡——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隐居起来了。

我们有三四年互不知下落，互不通音讯。1941年，我夫妇在陕西省乾州中学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业，王瑶兄突然自西安来乾州相访。乾州，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女皇陵墓之所在，也是唐德宗被朱泚之乱团团围困的地方，那时叫奉天。我当时每周34小时的英语课，喊得嗓子经常喑哑。租得民房东厢厦房一间，四壁萧然，只一盘大炕，夫妇二人带一新生不满周岁女儿，连孩子衬布都是山西新军带下来的供给制军装的破片。有被两床，我妻带婴儿一床，我与王瑶兄合盖一床。街上买点乾州名产——锅盔和挂面，妻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风箱煮些挂面，三人饱肚。日本飞机时常飞临上空，丢个把不大的炸弹或打一梭子机枪。

这时叶圣陶先生自成都寄给七律一首，末句云，“遥知此中皆战